

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历史逻辑

杨 军 王俊喆 辛姝贤

【摘 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要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必然性,就必须将其置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探究其历史逻辑。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共同塑造的统一体。广西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最多的自治区,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牢固树立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广西在政治上的共同历史记忆、经济上的互补与共存、文化上的相互交流共享、教育上的平等互助等是各民族共同发展的重要内容,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客观促进了中原地区文化与广西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

【关键词】历史逻辑;民族团结;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简介】杨军,博士,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广西 南宁 530022);王俊喆,江西财经大学艺术学院研究生(江西 南昌 310012);辛姝贤,南宁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广西 南宁 530100)。

【原文出处】《广西民族研究》(南宁),2023.6.68~77

【基金项目】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推进广西‘五个家园’建设研究”(23FMZ028)。

一、引言

习近平强调,“我国辽阔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1]508}。“四个共同”是把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从历史中国到现实中国一以贯之的中国史观,是系统全面看待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发展史观,是坚持各民族共创中华的整体史观。^[2]2021年4月,习近平视察广西期间,赋予广西“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崇高赞誉和“继续发挥好示范带动作用”的重大使命。为此,2022年5月13日广西召开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区建设的决定》。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必须坚持正确的历史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国、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中国是文明古国中文化传统和文明体系唯一未曾中断的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经历漫长的积累过程产生和发展的,我们有必要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与理论渊源进行梳理,总结出其历史必然性。广西有12个世居民族,除汉族以外,还有其他11个少数民族,分别是壮族、瑶族、苗族、侗族、仫佬族、毛南族、回族、京族、彝族、水族、仡佬族,另有满族、蒙古族、朝鲜族、白族、藏族等44个民族交错杂居。广西多民族的结构是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广西各族群众相互团结,共同营造了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这与广西历史上各民族交往交流是分不开的。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3]37}广西各民族先民频繁交往,积极吸收来自中原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主动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分享,共同绘出了中华各民族“美美与共”的和谐共生画面。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互嵌格局中的呈现

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我国岭南一带居住着百越民族,在广西较早出现的百越民族部落,史书记载为苍梧、西瓯和骆越。秦汉时期,居住于岭南地区的先民称为南越、西瓯和骆越,有时骆越和西瓯并称,到东汉则逐渐明确南越之西为西瓯。

秦朝时,秦始皇统一岭南,广西也正式成为中原王朝的一部分,中原地区汉人开始进入广西等岭南地区。据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派屠睢率50万大军征岭南,兵分五路,其中两支进入广西:一支通过谭城(今湖南靖县一带)之外五岭中的越城岭和萌渚岭之间的谷道,即湘桂走廊,进入今广西兴安、桂林一带,控制了漓江通道;另一支过九嶷山(今湖南宁远县南)古道,进入今天广西的钟山、贺县一带。进入广西境内的秦军‘三年不解甲驰弩’。”^[4]至此,中原地区的汉人开始进入广西。有书籍描述:“前时秦徙中县之民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5]7013}这是一次大规模地把中原地区汉人迁往岭南的移民活动。这一时期,同时也是中原地区汉人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广西,汉人移民广西的历史就这样开始了。

到东汉时期,西瓯和骆越又被称为“乌浒”

“俚”。“郁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乌浒人十余万内属。”^{[6]2842}“交趾、合浦乌浒蛮反叛。”^{[6]2843}“建武十二年,九真徼外蛮里张游率种人慕化内属。”“(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貳反……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里,蛮之别号,今呼为俚人。”^{[6]2846}这一时期,中原地区汉人在郁林(今贵港)、合浦两地都已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元初二年(115年),苍梧蛮夷反叛,遂招诱郁林、合浦蛮汉数千人,攻苍梧郡”^{[6]2848}。东汉末年,由于中原战乱,不少中原地区汉人为躲避战争,纷纷逃至广西等岭南地区,岭南地区的汉人人口逐渐增多。

三国两晋南北朝,广西境内主要有乌浒、俚、僚等。“交、广之界,民曰乌浒,东界在广州之南,交州之北,恒出道间,伺候二州行旅,有单迥辈者,辄出击之,利得人食之,不贪其财货也。”^[7]晋代,俚人分布的地区较为广泛,《博物志》记载:“交州夷名曰俚子,俚子弓长数尺,箭长尺余。”^{[8]73}南朝,俚人已有较大的发展趋势,俚人酋帅已经成为岭南地方重要的“政治势力”,出现了陈檀、陈文彻、冼夫人、钟士雄、宁猛力、王仲宣、李光仕、李佛子等著名大姓俚帅。这些俚人士官协助中央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有大批中原地区汉人在这一时期迁入岭南。如,著名学者士燮任交趾太守,其为人厚道,心胸宽广,众人皆知,固“变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9]900}。到西晋,有史料记载:“吏民流入交州者甚众。”^{[10]1186}这些中原地区汉人到来后,逐渐与当地各民族互嵌生活。

隋唐时期,广西作为偏远之地,朝廷经常会把中原或者江南地区的贬官或者罪犯发配到此。如柳宗元本人就是被贬为柳州刺史,“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

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因宜”^{[11][133]}。唐咸通年间,广西附近数道破产的游民,为了生存,大量流入邕州(今南宁)一带,于是邕州地区出现了“广蛮混居”的局面。

宋元时期是广西多民族聚居格局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宋代,原在岭北的瑶族逐渐向岭南迁徙。南宋时,大量的瑶人已居住在桂林附近,“瑶之属桂林者,兴安、灵川、临桂、义宁、永宁诸邑,皆迫近山瑶”^{[12][85]}。从宋朝开始,广西的汉人比重不断提升。元朝之时,瑶族已经分布于桂林地区、柳州地区、桂平和平南等桂中桂北地区。自宋代以来,苗族也逐渐从湘西、黔东的“五溪”一带向今融水境内的元宝山一带迁移,“外有省民冒法,商贩入南丹,受其贴牒,至内地干事者,多桂之兴安人。余亦物色得其渠,送狱,论如法,南丹稍警”^{[13][7642]}。整个宋元时期,原来主要分布在广西北部瑶族人,开始逐渐向南部扩展;而在贵州、湖南的苗族和侗族,也不断迁徙至广西,多民族杂居成为普遍现象。

明代,瑶族又不断地向南方迁移,形成了“岭南无山不有瑶”的“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广西大藤峡、浚水、横石等山,藤县太平等乡,徭僮啸聚掳掠,甚为民害,乞选良将,多调官兵、徭兵攻灭之。”^[14]“在宜州则有土丁、民丁、保丁、义丁、义效、撞丁共九千余人。”^{[15][254]}《明实录》记载云:“广西岭徼荒服,大率一省,徭人半之,瑶僮三之,居民二之。”^{[16][312]}这些都体现了广西各民族已经互嵌生活在一起。

清代,越来越多外地移民进入广西,广西汉人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这些汉人也逐步受到广西少数民族的影响。这一时期,“僮”这一说法已得到广泛采用,僮族又有很多叫法,如:布壮、布依、布土、布曼、布板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按照语言文化、生活习俗、心理素质等特征,将其统称为僮族,1965年,

将僮族改成了“壮族”;由于历朝历代都实施“分而治之”的政策,长期以来各民族都保持和谐友好的关系。^[17]

广西地区多民族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在历史长河之中孕育出来的。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原地区汉人的迁入距今也有2000多年的历史。从历史上看,中原地区文化是各民族优秀文化集大成者,中原地区文化为中华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引领了方向。各民族的迁入构成了广西多民族格局,给广西带来了先进的中原地区文化,这极大地推动了广西各民族的交融,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中的呈现

秦代,赵佗在岭南继续推行郡县制,同时结合中央王朝的官僚制度,和各级地方权力机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政治体系,大体上是采用秦汉中央王朝的官制体系。根据一些文献书籍和挖掘出土的材料,可以得知,南越国的官职名称中属中央百官或王宫官的有很多,如:丞相、内史、中尉、御史、郎、大傅、居室、泰(太)、景巷、乐府、私府食官、大厨、长秋居室、太后、夫人、常御等;军队设有将、左将、校尉等官员;地方设有侯、王、假守、那监、音夫等官员。^{[16][50]}同时,赵佗还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尊重越人的习俗,与越人通婚,并推广汉语。这些政策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秦军攻打岭南时造成的各民族间的隔阂,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融。

汉代,汉高祖刘邦定鼎中原后,汉王朝为了敕封南越国,于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陆贾对赵佗晓以利害、恩威并用,他说:“君王宜郊迎,北面称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强于此。汉诚闻之,掘烧郡王先人冢墓,夷灭宗族,使一偏将

将十万众临越,则越杀王降汉,如反覆手耳。”^{[18][1529]}赵佗听了陆贾的话后,经过一番权衡终于接受了汉高祖的封印,对西汉王朝称臣,汉王朝也正式承认赵佗的南越国政权,双方割符通使。从此以后,南越国经常向汉朝进贡岭南的特产,汉廷也有所回报,两地往来使汉越民族之间关系越来越紧密。

西汉时期,汉武帝平定南越和西南夷后,选择继续实行南越国“和辑百越”的民族治理策略,“以其故俗治”。除了直接派遣官吏统治岭南各郡外,还诏封许多归顺的南越旧官吏为“侯”。如,“越郎都稽因抓获南越丞相吕嘉,封为临蔡侯”^{[18][1796]};“南越校尉司马苏宏因抓获南越王赵建德有功,封为‘海常侯’”^{[18][1796]};“苍梧王赵光闻汉兵至而降,封为‘随桃侯’”。这些做法,对广西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增进了广西各民族与中原地区汉人之间的团结。

东汉时期,中央王朝改变了王莽对西南少数民族采取的镇压措施,恢复了西汉时期以抚慰为主的政策,给各民族首领“复故号”。“西汉末年任命的交趾牧邓让与苍梧太守杜穆、交趾太守锡光等在王莽篡汉后闭境自守,及至光武中兴,相率遣使贡献,被光武帝封为列侯”^{[16]67},这一举措,使岭南与东汉的关系开始恢复正常。到了灵帝建宁年间,谷永为郁林太守,他“以恩信招降乌浒十余万内属,皆受冠带,开置七县……”^{[6]2842}这反映了东汉封建统治政权为了强化对岭南少数民族的统治,采取了种种灵活多变的政策,使岭南地区一度紧张的局势得到缓和,民族关系有所改善,促进了该地区的发展。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居住在交通便利且与汉人杂居地区的俚、僚等人群,大多被纳入地方政权直接管理的州郡县,中央朝廷以同样的标准对他们征税。由于要加强对这些少数民族的统治,便在他们

聚居的地区设置所谓“左州”“左郡”“左县”等地方行政机构。^{[16]125}左郡、左县等行政机构的建立,标志着少数民族地区开始被中央政权直接管理,其间,中原王朝逐渐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纳入自己的封建生产方式之中,其先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习俗推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

隋代,一方面直接派遣中原地区汉人到各州县治任职,以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另一方面还任用当地各民族首领管理本民族事务。“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派令狐熙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19]2493}令狐熙大施恩信,他在广西任职的五年间,获得了各族首领的拥护与爱戴。“仁寿中,侯莫、陈颖,进位大将军,拜为‘桂州总管十七州诸军事’”^{[20]397},继续执行令狐熙的政策,因而“民夷悦服,溪洞生越多来归附。”^{[20]398}隋代经过一番治理后,广西有所发展,有些地区“列为郡县,同之齐人”^{[21]1831}。由此可见,隋代任用当地各民族首领的做法,不仅维护了统治地位,而且进一步促进了中原地区汉人与广西各民族的交流。

唐代对广西各族人民的统治,基本沿袭了隋代的措施,除在各州县治派遣汉人官员直接统治以外,同时也任命各族“首领”参与管理。如,“唐平定萧铣后,即以宁长真为钦州总管,命冯盎为高州总管等”^{[16]163}。而在各羁縻州县,地区的民族“首领”被授予担任都督和刺史等职务,直接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并允许世袭。“各羁縻州县‘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22]116}可见,唐代对广西的统治,依然很重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宋代,区希范领导的队伍进行起义,由于转战的地区范围并不广泛,不到一年时间,起义就宣告失败。此后被派到广西为桂州(今桂林)知州兼广西都巡检、提举兵甲溪洞事的萧固怵于广西各族群众的

反抗,因此,他治理广西本着“‘因其故俗,治以宽大’的方针进行的,其结果是‘广西遂安’”^{[23]878}。这个措施实施后,广西出现了安定的局面。而广西这一安定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广西发展,对广西各族群众的交往交流都具有重要意义。

元代,元军自北而南向静江府(今桂林)进军时,左、右江地区不少土官已经投顺了云南行中书省。因此,史格派员向各土官陈说归附云南之弊以及归附广西之利。结果由归附云南转而归附广西的州峒达50处之多。元军攻掠广西各地时,元军将士们掳掠当地人口作为私家奴婢;元军北撤之时,这些被掳掠的人口也被迫北上,在北去途中有的人伺机逃回广西。“湖广行省命令广西将逃亡的被掠人口送往北京,但史格拒不实行,而是将男女年龄相仿者互为婚配,结成夫妇。”^{[16]289}这些从北方逃回来的人们,避免了再次颠沛流离的痛苦,这样也就消除了广西不稳定的社会因素,对广西各民族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

明代,广西各族群众在面对共同的敌人之时,往往会相互配合、呼应,甚至采用联合作战的策略。天顺七年(1463年),因地方官府把大部分兵力都用于围剿大藤峡战场的起义军,所以柳州一带的防御力量明显薄弱,《明实录》记载说:“这时,八寨义军‘乘虚拥众攻劫上林县村社四十余处’,抢掠地主的土地、牛马和其他财富,取得重大战果。”^[24]“断藤峡等处瑶贼,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等诸洞蛮,连结数十余巢,盘亘三百余里。”^[24]这说明大藤峡起义军和八寨起义军是互相支援、共同战斗的。广西各民族起义军在经过长期的斗争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更好地结成了革命同盟,对各民族间的交融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清代,统治者针对广西地区的民族“动乱”,采用

独特的政策,让汉人对“僮人”的任用也进一步加强,据《岭表纪蛮》载:“僮人至此,遂不能不就吾轨范,而敛其凶锋矣。此等战役,同时皆有极多僮人,由土汉长官率领,而听受官军指挥,从征靖乱,赐爵受封。故华僮两族历史上交互之阶段,始则讨伐瑶寇,彼此联合,继则叛服不常,分合参半,终则参错而处,国民之权利义务,与汉人地位平衡,此其所以异于苗瑶两族,而其进化同化之速,远非他族所能及也。”^{[25]174}在治理广西地区“动乱”的过程中,汉官与当地“僮人”合力平定叛乱,两个民族之间交往交流逐渐加深,之后,“僮人”与汉人的交往更加频繁,关系更加密切。

长期以来,广西各民族一直保持着友好和谐的关系,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各朝代实行的各种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措施。历代王朝通过不同措施拉近中原王朝与广西地区的关系,推动各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各民族互嵌,这为广西各民族团结奠定了政治基础。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经济中的呈现

战国时期,楚国的冶铁技术最为先进。广西与楚接壤,通常会受到楚文化的影响,因此这一地区的越人,在自己有了冶铜技术的基础上,引进楚国先进的冶铁技术,利用本地富有的铁矿和鼓风等技术设备,可能会铸造部分铁器。^{[16]28}综观战国时期广西的社会经济,广西东北部是较早受中原地区文化尤其是楚文化的影响,因此,其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程度较高,在经济文化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秦始皇统一岭南后,大批中原地区汉人南下,为广西地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技术和器具,给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并逐渐与当地的各族人民建立起了良好关系。史载:“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为兵,略取南越陆梁地。”^{[10]101}“始皇开边,

专以有市籍者戍之,意者以边境贫瘠,使内地商贾经营其地,或可为兵略之助。”^{[126]49}秦始皇派商人到岭南地区,这无疑是对岭南商业发展的一个促进。

中原地区汉人到广西后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也为广西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条件。如,“汉高祖时与南越‘通使物’,‘使’是政治来往,‘物’即商业往还,当时商业交换的主要品种是金、铁、田器、马、牛、羊”^{[116]90}。后来,吕后听从长沙王,下令禁止向岭南输出这些东西。汉武帝平定南越后,取消了原来内地和岭南边关贸易的限制。从此,岭南地区与中原内地的商业来往就更加频繁了,极大地促进了双方友好往来。中原地区产品输入岭南,与此同时,一些岭南地区的产品也远销中原地区,包括岭南的食盐、水果、翡翠等产品。“汉武帝平南越后,边关岭南的土特产品如桔柚等,得以大批地销售到中原,以致使‘民间厌桔柚’,也就是桔柚多得使长安人都吃厌了。”^{[116]91}由此可见,汉代从广西销往中原地区的水果是相当多的,这表明广西与中原地区交往频繁。

从东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和中原地区战事不断,而南方地区则相对较为稳定、安全。从东汉末年以来,因避乱而南迁的汉人不断增加,其中有不少士族携家属及其“僮仆”逃到岭南来,重新在这里安家。“据说当时拥有权势的岭南豪族士燮,因‘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127]1192},他成为中原地区汉人前来投靠的中心人物。这些南迁的中原地区汉人,不仅把本民族的文化带到岭南地区,同时也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推广到广西来。据记载:“光武帝时,马援征交趾,‘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128]144}马援也曾经组织人修缮过秦时在广西兴安县开凿的灵渠,以便用于农业灌溉。广西地区的社会经济也因受到中原地区影

响,继续得到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不少中原汉人来到岭南,传播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促进了广西的开发,加强了民族交流。特别是隋唐时期,一些较有远见的地方官员被封建朝廷派遣到广西任职,他们先后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为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隋代的令狐熙,开皇年间任桂州总管时,在各州县建造城邑,开设学校,积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因而‘华夷感敬,称为大化’”^{[129]3414}。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韦丹出任容州(今容县)刺史,他“教民耕织,止惰游,兴学校。民贫自鬻者,赎归之,禁吏不得掠为隶。始城州,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种茶、麦,仁化大行。”^{[130]92}以上改革,都不同程度影响了广西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宋代,在广西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中,中原地区的商人运来食盐、丝绸、铁器等生产生活资料,与当地的牲畜、香料、木材、粮食及土特产等进行交换。有史料记载:“四曰射耕人,本福建人,射地而耕也,子孙尽闽音。”^{[131]36}这便说的是福建农民移居广西的情况。到了南宋年间甚至形成“州多平田沃壤,又有海道可通闽浙,故居民富实,市井居庐之盛,甲于广右”^{[132]908}的盛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的铁制工具、牛耕技术和文化传入广西,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贬谪到广西的文人、官员宣传中原地区文化,使得中原地区文化与壮族文化互相影响、相互共生、共同发展。

明代,广西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主要表现在农业方面。然而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广西的种植业规模与其农业支柱地位一直处于不对称的状态。“明末知名粤籍将领袁崇焕祖父亦是前往广西从事商品交易的广东商人之一,‘(入桂)始祖字西

堂,公祖籍广东省东莞县水南乡茶园村,于明正德元年,自粤东贸易广西梧州府苍梧县绒(戎)墟,居处数年,迁居藤县五都白马汛,受业建籍’。”^[133]⁹⁹伴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桂东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圩镇,如桂林大圩、苍梧戎圩、宾阳芦圩、贵县(今贵港)桥圩等。这对岭南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广西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都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清代,种麦已在镇安(今德保、靖西一带)、庆远府(今宜州一带)普遍出现;开矿、冶炼也在庆远、南丹一带开始兴起。中原地区汉人的一些先进农业工具也在该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南丹拉易乡壮族使用的水碾是由碾台、碾架和碾槽组合而成,而大瑶山瑶族使用的则是风车(也称为风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中原地区商贾进入壮峒瑶山,把食盐等产品带到此处,以换取谷米、油类、香蕈、竹笋等土特产。《桂平县志》载:“瑶山运出的山货即有玉桂、苓香、香菇、稻米、材木、腊笋、生姜等。”^[134]商贸活动的兴盛极大促进了岭南地区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历史长河中,中原地区统治者对于岭南地区的统治逐渐加强。其中,广西与中原地区的交流更加密切,在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先进技术的推动下,广西地区的整体经济获得了较大发展,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来说,广西的经济发展仍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

五、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文化中的呈现

商代,百越族曾向商王朝进献“仓吾翡翠”,有的文献说:“正南瓯、邓、桂国、损子、产里、百濮、九菌,请令以珠玕、玳瑁、象齿、文犀、翠羽、菌鹤、短狗为献。”^[135]⁸⁴这能看出,商代南方的越族已经开始向中原王朝上贡。而南方部族进贡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周

朝,《诗经·大雅》说:“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徂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136]¹⁰¹⁰可见,此时强大的周王朝已经与岭南的百越族有了一定的交往与交流。“秦戎五岭之前,灵渠尚未开凿,中原地区文化传入广西,多由湖南道州经龙虎关进入桂北,越城岭在西,萌渚岭在东,中间是平坦的台地,一条茶江由湖南经龙虎关流入广西恭城县地界,直趋平乐县,汇合于漓江”^[16]²⁵,这是中原地区文化传入岭南较早的走廊之一。

战国时期,“平乐县银山岭的陶器在盆、杯、钵的底部或下部,瓮、罐的肩部,普遍刻画有简单的符号,即‘五、廿、丫、X、川、0、7、E、%、※’等,显然属于记事符号;武鸣县安等秧山的陶器也分泥质陶和夹砂陶两类,但陶器上未见有施釉,同属东南地区‘印纹硬陶’系统,在陶器底部也刻画有‘八、上、X、川、山、井、※、凡’等简单记事符号”^[16]²⁸。

在我国南部出土的陶器上都发现这些符号的存在,可以看出,由于民族间频繁的文化交往,各地区的人们互相学习,因而创造出相似的记事符号。《周礼·地官》:“遂人四里为鄼。”“鄼,音曼、晚,与壮语呼村为‘曼’‘板’等音正同。”^[16]³⁴《楚辞》:“泛江潭兮。”“楚人名渊为潭,亦与壮语同。”^[16]³⁵上述例子可以证明,在春秋战国与之前时期,南方的“百越民族”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进行了密切的联系。

秦代,赵佗和他的南越王国鼓励“汉越”通婚,为了积极推动此事,赵佗带头宣布所有的赵氏王室与越人通婚。所以越人吕嘉在南越国中连相三王,“吕嘉宗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37]³⁸⁵⁵,甚至远离番禺的苍梧王赵光也与越人联姻。上行下效,南越国中的汉人官员迎娶越女,越族官员接纳汉女,成为南越官场的时尚,而民间的汉越通婚现象更

是普遍。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又使尉陀逾五岭攻百越。尉陀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可其万五千人”^{[18][3086]}。可见秦始皇同意中原地区派妇女到广西,但对于秦军的配偶问题,也只是解决了一小部分,而绝大部分南征的秦军士卒们,只能娶当地女性为妻,他们在岭南成家立业,这对岭南的安定、民族交融和社会进步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两汉时期,随着中原地区汉人的南迁以及广西与中原地区间频繁的友好往来,在长期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中,广西各民族已经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认同,民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对于汉字的使用,从岭南地区出土的文物可以看出,秦汉以后汉字被广泛使用,广西地区的墓葬中开始出现较多的文字材料。如:“贵港罗泊湾一号汉初墓中,出土了一件《从器志》木牍,正背面均用墨写秦代隶书,共372字;另一件残木牍上可见24字,还有10余枚残木简,上书3-8字不等;器上有‘百廿斤’‘布八斤四两’‘析二斗一升’‘二斗二升’等字样;器残片上有‘布山’‘市府(造)’等字样;随的具上也刻有‘胡’‘苏’等字样。罗泊湾二号汉初墓有‘左夫人印’章和‘家夫印’封泥,贺州汉初墓也有‘主禾司’封泥。”^{[16][100]}汉字的流通,不仅推动了广西文化的发展,而且为汉越之间的沟通交流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得汉越之间消除了因语言隔阂而产生的鸿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文化和当地民族文化在广西同时得到发展。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原地区的文人、学者等汉人陆续南下,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在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下,广西各民族得到了很大发展。颜延之(东晋末年到刘宋初期的著名文学家),在刘宋时期一度贬官为始安(今桂林市)太守。他在桂林期间,常到独秀峰下岩洞

读书,至今还留有他的“读书岩”遗址,后人在此题咏甚多;“他本人在独秀峰石壁上留有‘未若独秀者,峨峨那邑间’的两句诗,这是一首赞颂独秀峰的诗,也流露出他自己的性格”^{[16][150]}。虽然他的诗文在桂林留存的不多,但他这种勤奋读书的精神对岭南文风的开拓起到了积极作用,间接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有不少文人学士,因贬官或因宦游,而来到广西。由于这些人士的到来,中原地区先进文化传入广西,从而推动了广西文学艺术的发展。这一时期,广西文人写的笔记散文,深受中原地区文化影响。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年),无虞(今上林)县令韦敬一为当地少数民族首领撰写了《智城碑》,这是一篇骈体文,碑文辞藻华丽,属对工整,并运用了武则天创造的异体字:𠂔——日,𠂔——月;○——星;𠂔——天;𠂔——地;𠂔——年;𠂔——柒等。由此可见,当时中原地区文化已影响到桂西等少数民族地区,直接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宋代避难广西的文人墨客,仕宦谪宦记广西、述广西的著作数量比过去有明显的增加。《“桂海虞衡志”是南宋时期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今江苏人)的著作,全书分为13篇,是一部研究广西古代史、广西少数民族史很有参考价值的著作。”^{[16][340]}该书目证明了宋代中原地区文人墨客对广西文化的积极影响。

明代,移民对提升广西诗歌创作水平和文化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如柳州计氏始迁祖计国选,“本青齐人,明洪武初,从征至柳,以功授五都都享镇巡检。国选卒……(长子)仲政自力薄,不能扶归,因家焉”^{[38][225]},计宗道是柳州历史上第一位解元,他就出身于该族。著名的戴氏祖先移居柳州,而这一时期闻名全国的诗人戴钦则出自该家族,洪武初年,其族先

世于江西宁州(今修水县),迁至广西柳州,至戴钦时已是第六代。由此可见,明代移民广西的人群大部分来自中原相对发达的地区,他们不仅将先进的中原地区文化带入广西,还与广西各民族共同发展,这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广西诗歌的发展,提高了广西总体的文化水平,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清代,广西多民族互嵌格局已逐渐成熟,民间文化艺术表现为丰富多彩的内容和形式,而且这些内容形式的风格和情调富有地区和民族特色。中原地区流传的《梁山伯和祝英台》《孟姜女》《包文》等故事,在广西也广为流传,这说明一些富有人民性的传说故事,都是各族人民喜闻乐见的。但由于不同民族具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特点,其他民族传入的传说故事,往往都要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使之适合本民族的风俗。“如《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汉人的祝英台到了壮乡,她已经不是深居闺阁的秀女,而是结实健美的劳动姑娘;梁山伯和祝英台相遇的地点也不是在‘柳荫亭’,而是在祝英台洗衣裳的河边,他们同去读书时,都是自己挑行李,没有书童和丫鬟跟随身边。”^{[16]499}这也就能看出,在各民族长期交往的过程中,由于文化生活的渗透影响,民族的融合现象也日趋明显了。

在岭南这片土地上,各民族先民一道,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蛮荒之地”,并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39]1729}历史长河中,从先秦到清代,中原地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互相交融、互相渗透,极大促进了广西文化发展。这种趋势继承了文化多样性的传统,促进了中国多民族的团结统一。

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教育中的呈现

两汉时期,中原地区知识分子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汉代经文有今文经、古文经之分:将一些经学家

记忆的经文和他们的解释,用汉代流行的隶书抄写下来,是为“今文经”。“当时,苍梧广信(今梧州市)人陈钦,‘举茂才为五经博士,钦治左氏春秋……与刘歆同时而别自名家’。”^{[40]1842}可见广西虽然地处南僻,却也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产生了像陈钦这样的古文经学派名家。

隋唐时期,广西统一局面的出现,整个地区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加上中原地区先进文化技术的传入,这一切都促进了广西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武德五年(622年),在岑溪县治东,开始建置学府。”“贞观初,于博白县城南建县学。”“贞观元年(627年),历文材为容州刺史时,在容州建立了容州学府。”^{[41]235}贞观三年(629年),北流就始建学宫,当时的学宫就在登龙桥附近,后几经迁址重建,更名为大成殿。“元和十年(815年)柳宗元被贬到柳州后,也在柳州修复文宣王庙,‘尝为此州而新庙学矣’”“学者皆‘执经书引仁义’。”^{[41]235}大历年间,李昌任州都督时,也在民间提倡读书教化,“他在桂州独秀峰下当年颜延之的读书岩前,建‘宣尼庙于山下。设东西庠,以居胄子’”^{[42]31}。唐代兴科举、建学校的举措,极大地促进了广西的教育发展。

宋代,由于广西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这一时期,社会也具备了发展学校教育更好的条件,因此来广西做官的各地士大夫们都比较重视广西教育事业的发展。州县的地方官员亲临学校讲学解惑。如“灌阳县有的县令、县尉‘督赋外无他适,每至学评论古今,较量善否’”^{[41]237}“天圣年间知浔州孙抗兴‘庙学’‘亲为据按讲说’”^{[43]6340}。元祐年间邓璧知贺州,他“大兴庠序”,且每日“三造庠序,执经辩难,夜分不倦”。《学校志序》中说:“唐诏诸州县及乡并令置学,而李昌夔兴于桂,柳宗元兴于柳,其遗芳余韵犹可想见;至宋益斌斌矣。”^{[44]84}可见,广西的教育事业

在宋代发展得十分迅速,这些在广西当地做官的中原地区汉人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代广西的教育发展。

明代,统治者对教育十分重视,明祖朱元璋认为教育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洪武二年(1369年)他曾说:“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45][1686]}他还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教育之风,在中央设立了“国子监”,在地方设立了“府、州、县学”,在乡村设立了“社学”和“义学”等。有记载云:“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教官四千二百余员,弟子无算,教养之法备矣。”^{[45][1686]}在全国办学之风的推动下,广西的教育事业也有了明显的发展。为了促进教育事业,对参加文武会试的生员,均发给盘费。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在广西兴办学校,其兴学校的原因是当时广西处于偏僻地区,大部分百姓没有受过主流教育,圣学不明、人心不明,以致叛乱横生,于是他整日开讲,而当时百姓们也逐渐有奋发的感觉。^[46]他通过办书院、兴学校等教育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民族问题,有利于广西各民族的稳定和团结。明代在广西各地设立学校,侧面体现了明朝统治的深入。强化教育客观促进了中原地区文化与边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速了中原地区文化在广西的传播,具有深远的意义。

清代,广西的学校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大发展,人才辈出。统治者建立了一套学官制度,为了“开化”广西的苗瑶诸族,规定:“对苗生参加考试皆有特殊规定,如苗生应举时要有‘汉原生一名保结’,同时在卷面上‘填注苗民字样’。”^{[47][4532]}清代,把书院视为讲学育才的场所,责令各地政府大力兴建书院、广收学员。“早在南宋时桂林就设有‘宣成书院’,培养了不少人才,清时‘宣成书院’仍以桂林的老牌学府屹立于山水名城之中,而到了雍正年间桂林又增设秀峰

书院,到道光年间又增设桂山、榕湖(经)书院。”^{[16][488]}清代的桂林是广西书院较多的地方,“除桂林四大书院之外,清朝在广西的各府州县也都先后设立了许多书院如桂林府属的兴安县设有漓江、文笔二书院和全州的清湘书院”^{[16][489]}。总而言之,清代统治者在广西各地广设学校,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受中原地区的影响。

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广西,他们积极提倡广西各地区兴教育、办学校一些留桂官员和文人在其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各项措施的推动下,广西各族人民也开始对教育产生了空前的热情。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广西教育、文化等事业得到快速发展。

七、结语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活在广西大地上的各民族交融凝聚,共同发展,联系日益密切,统一性、整体性不断增强。^[48]不论是统一时期还是政权并立时期,广西都随着中华大地上的朝代更替、政权变迁,与事实上的“中国”同为一体。广西各族群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日渐清晰,这与中原地区汉人和广西各民族相互影响密不可分。历史上,各民族互嵌格局早已形成,统治者在政治、军事、教育、文化等方面的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要立足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通过研究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才能搞清楚广西民族团结的大好局面是在悠久的历史中各民族共同努力形成的。广西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历史逻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推动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要继承和弘扬由各

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49]以期通过对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逻辑研究,展现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引导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实现现代化征程中,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为广西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与实践贡献历史智慧、夯实历史根基。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2]王延中.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观[J].历史研究,2022(3).
- [3]费孝通.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4]张寿祺,黄新美.粤西“标话”人群乃古代苍梧族群遗裔考:兼论其与侗族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1993(1).
- [5]吕思勉.吕思勉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6][南朝]范晔.后汉书·卷86:南蛮西夷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7]万震南州异物志:卷七[M/OL].<https://houhanshu.5000yan.com/nmxnylz/2441.html>.
- [8][西晋]张华.博物志·卷2:异俗[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9][西晋]陈寿.三国志·卷49:吴书四·刘繇太史慈士燮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0][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9.
- [11]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23.
- [12][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M].胡起望,覃光广,校注.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 [13][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31:四裔考八[M].北京:中华书局,2011.
- [14]王鏊.明宪宗实录·卷4:成化实录[EB/OL].[2017-08-09](2013-11-20).http://sky.cssn.cn/sjxz/xsjdk/zgjdslb/jsbml/mxzs1_14484/201311/t20131120_844821.shtml.
- [15]赵永胜.中国西南与中南半岛古代民族源流、分布及其演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 [16]钟文典.广西通史:第一卷[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
- [17]杨军.广西多民族杂居格局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互动空间研究:广西民族区域自治60年历史经验研究系列论文之二[J].广西民族研究,2018.
- [1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21.
- [19][唐]魏征.隋书·南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20]谭其骧.长水粹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21][宋]费枢,黄汝亨.廉吏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0.
- [22][宋]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94:尚书祠部郎集贤殿修撰肖君墓志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 [23]王守仁.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24]王鏊.明宪宗实录·卷86[EB/OL].[2017-08-09](2023-11-20).http://sky.cssn.cn/sjxz/xsjdk/zgjd/sb/jsbml/mxzs1_14484/201311/t20131120_844821.shtml.
- [25]刘锡蕃.岭表纪蛮[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4.
- [26]王孝通.中国商业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
- [27][西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 [28][西晋]范晔.后汉书·卷24:马援传[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29][唐]魏征.隋书·卷56:令狐熙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30][宋]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新唐书·卷6:循吏列传·韦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31][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五民[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18[M].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1.
- [33]阎崇年.袁崇焕资料集录(下册):袁氏家谱[M].南宁:

广西民族出版社,1984.

[34]秦海燕.试析广西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历史渊源[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11).

[35]逸周书·卷7:王会解[M].济南:齐鲁书社,2010.

[36]陈子展.诗经直解[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37][汉]班固.汉书·卷95:西南夷两粤朝鲜传[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8]文应时.计氏豢龙传[G].香港:香港新世纪国际金融文化出版社,2000.

[39]李德洙.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

[40]吕思勉.吕思勉文集:读史札记[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

[41][清]汪森.粤西文载校点二·卷25:柳宗元·柳州新修文宣王庙碑[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42]桂海碑林博物馆.桂林石刻碑文集:上册[M].桂林:漓

江出版社,2019.

[43][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卷243:宦绩录[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44][清]汪森.粤西文载校点四·卷52:学校志序[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45][清]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志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6]郝永.用夏变夷:王阳明的贵州.广西民族教育[J].王学研究,2017(1).

[47][清]谢启昆.广西通志·卷165:经政略一五·苗生额[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

[48]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J].历史研究,2022(3).

[49]杨军,戚可夫.运用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实践路径:以“刘三姐”文化为例[J].南宁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

The Historical Logic of the Sense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n Guangxi

Yang Jun Wang Junzhe Xin Shuxian

Abstrac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the core of the party's national work in the new era.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is rooted in the long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which means that if we hope to achiev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of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we must place it i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explore its historical logic. China has been a unified multi-ethnic country since ancient times, and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s a unity shaped by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existence of all ethnic groups. As the province populating the most ethnic minorities in China, Guangxi promotes equality, unity, mutual assistance and harmony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and firmly establishes the vision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Historically, the shared historical memory in politics, complementarity and coexistence in economy, exchange and sharing in culture, and the equality and mutual assistance in education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all ethnic groups, which also leave us with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lay a solid historical foundation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xchanges among all ethnic groups have jointly created a splendid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objectively promo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ethnic groups in central China and those in Guangxi, finally facilitating the formation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 historical logic; national unity;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